

南亚东南亚与西欧恐怖主义产生的 根源及地区特点

安高乐

摘要：“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威胁日益凸显。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可分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宏观因素包括历史政治因素、政治暴力、经济和社会根源。微观因素包括社会认同危机、相对剥夺感、个人特点和个人经历。世界各个地区的恐怖主义有着不同的特征。南亚既是恐怖主义的重灾区，又是恐怖主义的庇护所，恐怖主义活动以跨境袭击居多。东南亚地区以“伊斯兰祈祷团”为主体的恐怖主义组织与南亚的“基地”组织相比结构较为松散，恐怖主义活动多以西方人出入的景点、餐馆和酒店为袭击目标。西欧的恐怖主义则大多数都选择西欧国家的首都或者重要国际组织所在地发动恐怖袭击。

关键词：南亚恐怖主义；东南亚恐怖主义；西欧恐怖主义；基地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相对剥夺论

收稿日期：2020-09-15

作者简介：安高乐（1973~），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际社会中去极端化模式比较研究”（课题号为17BGJ066）的阶段性成果。

“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对人类威胁的致命性日益凸显，许多专家学者对恐怖主义的诱因进行研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可分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宏观因素包括历史政治因素、政治暴力、经济和社会根源。微观因素包括社会认同危机、相对剥夺感、个人特点和个人经历。各个地区的恐怖主义有着不同的特征，南亚既是恐怖主义的重灾区，又是恐怖主义的庇护所，恐怖主义以跨境袭击居多；东南亚地区以“伊斯兰祈祷团”为主体的恐怖主义组织与南亚的“基地”组织相比结构较为松散，多以西方人出入的景点、餐馆和酒店为袭击目标。西欧的恐怖主义大多数都在首都或

者重要国际组织所在地发动袭击。本文拟从三个部分进行考察：第一部分对恐怖主义的历史进行简要的回顾。第二部分考察和解释恐怖主义形成的各种理论。第三部分研究恐怖主义的地区特点。由于本研究主要集中于南亚、东南亚和西欧，故在讨论恐怖主义的地区特点时未涉及其他地区。当然，即使将焦点放在以上三个地区，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也不能做到全面深入，难免存在挂一漏万的情况。

一、恐怖主义的发展历史

（一）恐怖主义的早期形态

有关恐怖主义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通常来说，恐怖主义可以被广泛地理解为一种胁迫手段，通过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来传播恐惧，从而达到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目的。恐怖主义并不是人类安全面临的新挑战，而是有着久远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雅各宾派对被怀疑是革命敌人的公民实施暴力恐怖政策。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和“集体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现是恐怖主义的另一次演进。1853年，德国的卡尔·海因岑（Karl Heinzen）在颇具影响力的小册子《莫德与弗赖海特》（Mord und Freiheit）中，首次宣扬通过使用暴力甚至大规模杀人的方式来实现政治变革，并创造了“自由战士”一词。这些早期激进分子对未能通过传统手段（如散发小册子敦促暴动使政府承受压力）在农民中引发广泛的社会革命而感到失望，他们转向暴力，以期实现政治改革。这样，“行动的宣传”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策略，成为欧洲无政府主义政治的核心。当时几乎所有这些团体都采用暗杀等暴力手段。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到暗杀，使得暗杀活动成为这一时期恐怖主义活动的特点。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14年6月28日，年轻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在萨拉热窝暗杀了奥地利大公和继承人弗朗兹·费迪南德及其妻子，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现代恐怖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后殖民国家转型尝试的失败、以色列的创立引发了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一系列反西方的变革和运动。这些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加上他们认为恐怖主义可以有效地实现政治目标，产生了第一波现代国际恐怖主义。20世纪60年代后期，诸如法塔赫（Al Fatah）和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之类的世俗运动开始将目光投向直接冲突领域之外的平民。在以色列1967年击败阿拉伯军队之后，巴勒斯坦领导人意识到阿拉伯世界无法在军事上与以色列对抗，于是巴勒斯坦人从典型的游击战转向了城市恐怖主义。激进的巴勒斯坦人利用现代通信和运输系统，使他们的斗争国际化。他们发动了一系列劫机、绑架、炸弹和枪击

事件，其中最有名的是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对以色列运动员的绑架和枪杀事件。

1979年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发展的转折点。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了人们对什叶派伊斯兰革命浪潮的担忧。同时，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以及随后从1979年至1989年的反苏“圣战”，导致恐怖组织的崛起和扩张。在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支持下，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地的志愿者赴阿作战。阿富汗战争结束后，训练有素且富有战斗经验的极端分子急剧增加。例如，沙特为也门的“伊斯兰阵线”志愿者提供财务、后勤和培训支持。所谓的“阿拉伯阿富汗人”利用他们的经验来支持北非、克什米尔、车臣、波斯尼亚和菲律宾的地方叛乱。在这一时期活动的主要极端组织有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哈马斯、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等。

1990~2001年，是恐怖主义的全球化扩散时期。冷战结束后，苏联的解体和独联体国家的武器扩散，在世界范围内助长了恐怖主义的扩散。在巴尔干、阿富汗、哥伦比亚和某些非洲国家发生的冲突，为恐怖分子的训练和招募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随着跨国交通和通信便利程度的提高，恐怖主义的暴力危害达到了新的高度。从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来看，阿富汗自1989年苏联撤军以来已成为恐怖主义的训练场。巴基斯坦因克什米尔问题和与塔利班的特殊渊源而成为恐怖主义高频活动国家。这一时期在南亚活动最为频繁的极端组织和运动有：塔利班、基地组织、穆罕默德军、虔诚军、自由人党、伊斯兰圣战运动以及哈卡尼网络等。在“9·11”袭击发生后，各国政策制定者迅速宣布跨国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安全的极端威胁。一些人将西方与伊斯兰恐怖主义之间的冲突定性为“第四次世界大战”，认为“9·11”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

二、有关恐怖主义的相关理论解释

“9·11”事件发生后，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威胁日益凸显，很多学者对恐怖主义的诱因进行研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进行解析。极端化的原因千差万别，没有单一的因素能够对极端化进行解释。本文设定了根本原因模型，并借此分析导致穆斯林极端化的因素。在模型中，“根本原因”指没有它就不会导致极端化过程的因素。哪些因素导致极端化？在这方面，根本原因模型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该框架可以分析不同层级上的因果变量如何相互关联，以及它们如何塑造极端现象（或多或少）产生的环境。因此，该模型可作为进一步研究和应对极端化过程的起点。由此，可以得出关于解释性变量如何与暴力和非暴力极端化关联的可检验假设。分析的重点是嵌入式个体（embedded

individual)，也就是说，本研究是基于极端化首先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该过程只能通过个人的社会环境来理解。极端化研究者通常将具有共同特征的组织作为分析的主要单元。一些学者主要将群体层面的特征作为极端主义的解释，而很少关注个人情况。为避免这种情况，有必要将极端化理解为在社会环境中发生的个人行为。因此，我们需要研究个人的特征及其社会环境，从直接的社会网络到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为了考察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根源，首先应解析个体极端主义的根源，然后基于个体层面的理论，在集体层面上找出应对恐怖主义的办法。

根本原因模型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区分因果因素，并把宏观因素看作是极端化的前提。为了将个人作为嵌入式单元进行研究，微观因素被细分为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社会因素描述个人的社会地位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因素描述个人环境并解释个人如何看待环境的过程。除了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以外，还存在导致极端化加速的催化剂。

恐怖主义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不同维度和层面上的因果关系如何相互关联，以及它们如何共同促进极端化。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因不同的测量水平而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从外向内，外层代表宏观层面的原因。宏观因素与社会结构有关，包括人口变化、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化、教育程度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等因素。这些背景因素通常被认为是犯罪和越轨行为的前提。例如，肖（Shaw）和麦凯（McKay）认为犯罪是社会文化、结构和社会特征的产物，而下层男性的行为异常是对情境因素的正常反应。^①同样，涂尔干（Durkheim）研究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并假设破坏的社会结构会引起社会规章制度的侵蚀和失序状态，随后导致个人的不轨行为和社会失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自杀。^②因此，宏观因素构成了有利于极端主义环境的前提，并可以解释进入劳动力市场遇到困难年轻穆斯林如何表现沮丧或不满。但是，即使在失序的社会条件下，也只会诱使少数人走向极端化，而不是导致所有人走向极端化。宏观因素不能单独解释少数特殊的极端化现象，为了了解社会的宏观特征与极端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必须考虑个体及其融入社会方式的微观因素。

微观层次由两个内层组成。为了强调对个人的关注，将微观层面进一步分为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由第二层代表的社会因素定义了个人与相关“他者”的关系。这些“他者”不仅包括与“我者”互动或组成一个群体的人，而且还包括

^① Tinka Veldhuis, “Islamist Radicalisation: A Root Cause Mode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October 2009, p24.

^② Ibid..

其他群体的个人。人们如何看待和对宏观因素作出反应，还取决于他们是谁，生活在哪里，他们相信什么，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信仰什么等。泰菲尔（Tajfel）认为，社会认同决定个体行为。^①对于强烈认同其宗教团体的人们，这种影响甚至更大。斯特鲁奇（Struch）和施瓦兹（Schwartz）通过研究以色列各宗教团体之间的冲突后发现，人们认为自己的宗教团体与其他宗教团体发生冲突烈度越大，则预示着对其他宗教团体的侵略性越强。^②对于自己的宗教认同度越高的群体，这种影响甚至更大。换句话说，人们对自己群体的认同感越强，就越有可能认为对其他群体采取侵略行为理所当然。

模型的第三层面代表个人层面的因果因素。像社会因素一样，个体因素是微观因素的子集。个人层面上的因素包括心理特征、个人经历、个人信仰和性别等因素。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个体特征如何影响其行为，这可以从男女之间的生物学差异以及这种生物学差异的后续行为中找到。达蒙（Damon）认为，一般而言，男人比女人更具侵略性，也更有可能是表现出身体侵略性，而女人则倾向于表现间接和口头形式的侵略性。^③此外，与女性相反，男性通常认为某些侵略行为是积极可取的英雄行为。^④因此，对性别差异的研究清楚地说明了个人特征如何影响其在特定情况下可能表现出的反应类型。

除了将因果因素分为宏观和微观层面因素外，还应区分原因和催化剂。与原因相比，催化剂通常是不可预测且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催化剂可以出现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并且经常渗透到这两个层面中。催化剂因人而异，比如一般人说出挑衅性语言，其影响不大，但如果出自公众人物之口，则会成为事故的诱发因素。此外，催化剂加速极端化过程，但不能自然引发极端化。同样，只有与其他因果因素相互作用，催化剂才能促成极端化。

（一）宏观因素理论

宏观因素理论包括历史政治根源论、政治暴力理论、经济和社会根源等。

1. 历史政治根源论

人们普遍认为政治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是古老的现象。正如李曼所说，恐

^① H.Tajfel & Turner. J.C,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1979, Monterey, CA: Brooks-Cole, pp33-47.

^② M. Struch & H. Schwartz, "Intergroup Aggression: Its Predictors and Distinctness From In-Group Bia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6, Issue 3, 1989, pp364-373.

^③ Tinka Veldhuis, "Islamist Radicalisation: A Root Cause Mode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October 2009, p25.

^④ A. Campbell & S. Muncer, "Models of anger and aggression in the social talk of women and me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Issue17, 1987, pp489-511.

怖历史是人类行使政治权力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利用恐惧和暴力进行统治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①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恐怖主义”一词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②但恐怖主义的发展则是在20世纪。最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了世界政治体系中恐怖主义的历史模式，该研究为恐怖主义与世界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政治体系与恐怖主义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这表明恐怖主义是政治体系缺陷的产物，在这些政治体系缺陷得到纠正之前恐怖主义不会消失。威尔金森认为，目前，恐怖主义可以解释为弱势群体对当前国际体系所支持的领土、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挑战。^③恐怖主义将当前的国际体系视作不公正，认为自己是在捍卫弱者，并惩罚强者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

恐怖主义就像是现有政治系统的癌细胞。如果政治体系运作良好，则该癌细胞将在政治体系内隐而不发。如果系统不能完美运行，恐怖主义将成长并传播到整个政治系统中。威尔金森指出，革命暴力直接来自一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冲突。^④革命暴力被视为关于政府合法性、政治权利以及为获得权力而冲突的产物。它通常是由于政府拒绝或不能满足一个强大的集团或联盟对其提出的某些要求而造成的。对现有政治体系及其治理的审视，将得出有关恐怖主义根源的一些信息。例如，民族恐怖主义可能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因为民族主义意味着该国的主要族裔群体受到了高于其他民族的重视，而其他民族则长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毫无疑问，二战后最成功的革命战争中，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最具吸引力的是抵抗征服者或从殖民主义国家获得独立。今天，很难在任何国家看到任何殖民势力，但是民族国家内部的许多种族群体将占统治地位的种族群体或政府视为殖民势力或占领者。例如，“库尔德工人党”声称它只是在自卫并保护库尔德人。

除了将恐怖主义视为民族国家的产物外，在中东还将恐怖主义视为专制政治体系的产物、造成贫困和失业的经济体系的产物、巴以冲突的产物。相关的另一种政治体系是国际体系，特别是当前的均势失衡，如中东因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部分领土而导致地区的力量不平衡。美国的力量及其某些外交政策可能被视为

① R. W. eeman, “Rhetoric and Values in Terrorism” in M. Slann and B. Schechterman (eds.), *Multidimensional Terrorism*,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45-53.

② P. WILKINSON,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errorism”, in M.L. Sondhi eds., *Terrorism & Political Violence: A Sourcebook*, Indi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p19-49.

③ Bekir Çınar, “The root causes of terrorism”, METU Studies in Development, June, 2009, p97.

④ Ibid..

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自从强大的竞争对手苏联崩溃以来，美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采取了符合其利益的行动。布什总统指出，“恐怖分子杀戮不仅是为了终止生命，而且是为了破坏并终止某种生活方式”。^①从恐怖主义的角度来说不是要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不满美国在中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正如“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所说，“华盛顿和以色列在反对穆斯林的同时，利用沙特阿拉伯、埃及和约旦政府来保护自己的利益”。^②

有时，恐怖主义与得到大量民众支持的社会运动或政党有关，这主要是由于这些社会运动或政党提供急需的社会服务之类的非暴力活动，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就是这样的行为体。这些行为体在没有恐怖主义的情况可以生存和发展，但其为了向政府施压而把使用恐怖主义作为权宜之计。在某些情况下，恐怖主义可能会受到大众的欢迎，特别是后者受到歧视并遭遇不公平待遇时更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公众不仅支持恐怖主义背后的目标，而且支持为实现目标而采用的暴力手段。如果没有公众支持恐怖主义背后的目标和方法，恐怖分子就无法成功地从事任何恐怖活动。通过考察恐怖分子的行为，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进行施暴的恐怖分子，另一个是提供支持恐怖分子。后者可能不是恐怖组织的实际成员，但其提供的支持仍然是恐怖主义的一部分。这种支持可以是金钱、物品、媒体和其他形式。

2. 政治暴力论

政治暴力是导致冲突的一种极端方式。从历史上看，使用暴力来实现政治变革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一般而言，暴力是个人或团体为了加强自己的意愿而单方面行动的产物，并且由于双方的权力不平等，因此没有进行谈判的空间。暴力行为可能与特定的地点和时间有关，可以在社会结构中得到维持和复制。暴力是对他人身体强加的干预，使他人遭受肉体和精神痛苦，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造成死亡，政治暴力还可能涉及侵犯人权的行为。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政治暴力不可避免，因为人们之间的资产分配不公平。为了改变不合理的现状，潜在的叛乱分子可以通过诉诸暴力来推翻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当发生一系列的社会错位，诸如城市化、现代化、移民、失业和贫困时，冲突可能更剧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争端越棘手，弱势一方越有可能采取非法或恐怖的形式。戴维斯认为，使用政治暴力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改变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政治和经济现

^① Bekir Çınar, “The root causes of terrorism”, METU Studies in Development, June, 2009, p99.

^② Ibid..

状。^①秉持“民权剥夺理论”的威尔金森认为，政治暴力是由相对剥夺之后发生的社会挫败感造成的。该理论认为个人或团体可能会感到剥夺是问题的根源，而暴力的使用对那些被排除在国家机构之外的人更有吸引力。^②

3.经济和社会根源论

(1) 经济根源论

对于经济因素是否助长恐怖主义，答案各不相同。一方面，大量评论和一些学术研究表明，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之类的经济状况会影响受剥夺程度、不公正感，造成紧张局势，因此会导致恐怖主义。^③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很难在恐怖主义与经济状况之间建立直接联系。^④恐怖主义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政治通过制定经济政策来影响经济。如果这些政策造成了更多的不公正，收入不均和贫困，那么因这些政策而遭受苦难的人将对政客表达不满。因此，经济条件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间接联系。

经济学家威廉·兰德斯（William Landes）、托德·桑德勒（Todd Sandler）和沃尔特·恩德斯（Walter Enders）将犯罪经济模型应用于跨国恐怖主义。就市场机会与参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而言，经济模型几乎没有做出具体的预测，因为具有不同特征的个人参与恐怖行为取决于带来预期政治变革的可能性，也与实现恐怖分子预期目标的不同回报与惩罚有关。例如，如果受过良好教育者认为能够实现其目标，他们将担任恐怖组织的领导职务。如果他们比受过较少教育者更坚定地认同恐怖组织的目标，那么他们可能会更积极地参加恐怖组织。^⑤经济条件确实对恐怖主义的根源产生了影响，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穷人比富人更多地参与恐怖主义，或者穷国比富国更多地参与恐怖主义。

(2) 社会公平状态理论

社会公正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存在社会公平正义，那么社会就牢固而团结，人们可以相互信任，并努力保持和平而不诉诸暴力。如果财富分配不均，政客偏爱某个集团或阶层，那么最终将侵害其他集团或阶层的利益。这不仅

① Bekir Çınar, “The root causes of terrorism”, *METU Studies in Development*, June, 2009, p103.

② Ibid..

③ B. Burgoon, “On Welfare and Terror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and Political economic Roots of Terrorism”, *ASSR Working paper 04/07*(September) (2004), Amsterdam School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178, <http://www2.fmg.uva.nl/assr/frdocs/wp/downloads/ASSR-WP0407.pdf>.

④ A. B.Krueger and J.Maleckova, “Education, Poverty and Terrorism: Is There a Causal Conn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 (4), (2003a), p41.

⑤ W. Enders and T. Sandler, “After 9/11: Is It All Different Now?” April 2004, <http://www.cidcm.umd.edu/carnegie/papers/sandler.pdf>.

在国家内部，而且在世界经济中也是如此。2003年初，英国贸易和工业部长帕特里夏·休伊特（Patricia Hewitt）说：“如果我们西方国家不建立既公平又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们将为此付出恐怖主义加剧和不安全感增加的代价。”^①实际上，尽管世界财富在增加，但全球经济的成果却远未公平分配。贫富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地球上60亿人口中，有3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有1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15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的水。与此相对，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个人的平均资产为50亿美元，^②这自然增加了贫困者的愤怒。

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侵蚀了民族认同感，降低了社会稳定性，形成了宗教激进主义滋生的土壤。当国家无法照顾自己的民众时，人们就会对其失去信心，并且往往倾向于不投票，因为他们对任何候选人都不同意。极端右翼政党在西欧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表明，极端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的问题不仅存在于贫困国家，发达国家也难幸免。

4.整合不良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欧洲国家涌入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大量移民，移民在西欧各国形成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区。这些移民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伊斯兰国家，其结果是穆斯林在一些国家中占据了很高的比例。欧洲的人口转变带来了移民问题的政治化和公共话语化。为了改善少数群体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各国政府制定了干预措施，要求移民必须接受融合计划，其中包括历史课程、语言课程的学习和考试，只有通过这些课程才能获得永久居留权。总体而言，穆斯林移民的文化程度较低，通常生活在社会经济落后地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时面临一系列的困难。糟糕的是，整合效果欠佳不仅仅存在于社会经济方面。在许多欧盟国家，穆斯林在政治领域的融合程度也很低。2006年，“欧洲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监测中心”（the European Monitoring Centre on Racism and Xenophobia, EUCM）开展了一项关于欧盟成员国内穆斯林歧视的研究，其中包括一份对欧洲穆斯林进行访谈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受访者认为，穆斯林在公共机构和组织中的代表性不足，决策者和公共当局并未将穆斯林的需求列入优先议程。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穆斯林普遍受到歧视，有时穆斯林被邀请参加公开辩论并不真正代表让穆斯林参与政治议程。^③EUCM的报告说明了穆斯林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

^① Bekir Çınar, “The root causes of terrorism”, METU Studies in Development, June, 2009, p109.

^② Ibid..

^③ Tinka Veldhuis, “Islamist Radicalisation: A Root Cause Mode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October 2009, p30.

的不良融合导致穆斯林在宏观层面上的被歧视感。同时，它也说明了宏观变量如何对社会和个人产生影响。不管是否有意，对穆斯林的制度歧视不仅对穆斯林的经济和政治融合构成了严重威胁，也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和心理影响。

5. 催化剂

玛莎·克伦肖 (Martha Crenshaw) 在《恐怖主义的根源》一书中明确区分了宏观因素和诱发因素。^①从长远来看，为恐怖主义奠定基础的是宏观因素，也称为先决条件和根本原因，而恐怖主义发生的情境因素则被称为诱发因素或催化剂。催化剂包括复仇事件，例如被剥夺参与某次政治事件、对该族群的某次暴力行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犯罪嫌疑人死亡、某次有争议的选举以及公众人物的挑衅性演说等。丹麦卡通画事件导致“阿拉伯之冬”，关塔那摩虐待俘事件导致更多暴恐事件，这些都是在机构层面触发恐怖袭击的例子。^②

通过这些理论探讨，本文旨在证明宏观条件是极端化的前提，但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走向极端化而另一些人却没有走向极端化。对极端化的解释应考虑到微观因素的作用，如个人和社会条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 微观因素论

个人受到环境的影响并不是一个新的假设，社会学家主要关注系统或宏观水平的变量和相互作用，而社会心理学家则分析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米尔格拉姆 (Milgram) 的服从性实验和津巴多 (Zimbardo) 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告诉我们，行为环境和社交环境在塑造人类行为方面发挥强大的作用。^③如果我们要了解个人行为如何走向极端化，一方面我们需要研究个人如何受到极端化社会背景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研究个人如何影响极端化的社会背景。

1. 社会认同危机论

自我分类理论 (self-categorisation theory) 和社会认同理论 (social identity theory) 的代表学者特纳 (Turner) 认为，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根据群体成员而不是个人来定义自己。^④人类从这种自我感知的团体成员资格中获得的社会认同感，使其能够区分自己的团体 (内群) 和其他团体 (外群)。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人们通过与内群 (in-group) 的认同来实现自尊。当特定的社会认同强势的时候，该社会认同提供一个框架，通过该框架人们可以解释和分析周围的世界，并确定

^① M. Crenshaw, "The Causes of Terrorism",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3, 1981, pp379-399.

^② Tinka Veldhuis, "Islamist Radicalisation: A Root Cause Mode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October 2009, p39.

^③ Ibid..

^④ Ibid..

自己如何思考、感受和行动。马希德（Mershed）和帕万（Pavan）认为，团体的身份认同及其屈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及集体行动产生的微观原因之一。^①换句话说，当穆斯林缺乏令人满意的社会认同时，极端化便会变得显而易见。如果人们在身份危机中挣扎，例如人们感到被自己想加入的团体拒绝，或者不确定自己想加入哪个团体时，会发生什么？西方国家第二代穆斯林通常遇到这一类问题，一方面他们面临着因种族或文化背景而产生冲突的身份危机，另一方面又有被社会排斥的感觉。例如，赫曼斯（Hermans）通过在荷兰进行的研究发现，许多年轻的摩洛哥人在荷兰社会中感到受歧视和不被接受。^②布伊吉斯（Buijs）认为，荷兰的摩洛哥年轻人疏远父母和所生活的社会，他们的混合身份不被环境所认可和接受。^③结果，他们在伊玛目（Ummah）中找到将自己与其他穆斯林联系在一起并令自己满意的身份认同，因此对他们来说，国籍变得无关紧要。选用身份认同方法后，身份认同的宗教性越强，他们对穆斯林身份认同的潜在威胁或攻击就越可能做出强烈攻击或报复行为。这些年轻的穆斯林对自己是否是荷兰人、丹麦人、英国人、摩洛哥人或巴基斯坦人并不关心，关心的是他们感到自己是穆斯林，并且是受到威胁的穆斯林。无论这些威胁是真实的还是自我臆想的，对身份认同构成的威胁通常都会导致内群偏好（favouritism for the in-group）和外群贬损（derogation of out-groups）。^④也就是说，内群偏好往往导致内群成员对外群集体或者个人采取暴力行为。根据这一理论，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指出，对宗教身份的威胁可能会促使穆斯林撤退到一个严格规定的、内卷的、被自己的边界所困扰的社区。^⑤同时，极端伊斯兰教可能日益成为社会和政治动员的有用工具。

2. 相对剥夺论

许多学者认为，对某一群体来说，一些个体即使自身没有被剥夺，但还是会代表团体行事，因而对某阶层的相对剥夺会引发集体暴力行动。^⑥论述政治动荡与相对剥夺之间关系的最早且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古尔（Gurr）的《人类为何反抗》（Why men rebel），将相对剥夺定义为行为者（通常指个人）对其价值与自

① Tinka Veldhuis, “Islamist Radicalisation: A Root Cause Mode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October 2009, p39.

② Ibid., p41.

③ Ibid..

④ Ibid..

⑤ Ibid..

⑥ W.R.Runcima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Routledge, 1966, pp1-5.

身价值能力之间差异的看法。^①换句话说,人们认为他们应有的权利与期望获得的结果之间的差异会导致人们感到被剥夺。因此,赤贫并不一定带来穷人的相对剥夺,无论是否满足基本需求,人们都可能在主观上感到被剥夺。古尔称,无法获得被认为是正当的东西会引发挫折感,最终助长集体暴力的产生。古尔使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其中包含挫败—攻击假设的原理,能够证实个体在遭受挫折的环境下很可能采取报复性的暴力行为。但是,古尔的理论在证伪方面遇到了麻烦,即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很多经济上受挫的人从未走向极端化。戴维斯(Davies)的期望值上升理论(theory of rising expectations)对古尔的理论作了补充和发展,认为剥夺不仅可以与相关的其他人相比较,而且可以与人们自己的期望和先前的成就相比较。根据戴维斯的说法,生活水平正在改善的人们往往高估了他们认为生活应该改善的步伐。结果,人们的期望与现实之间出现落差,于是随之而来的挫败感增加了社会动荡和革命情绪的可能性。^②事实上,期望值上升理论已经指出,敌对性和宗教激进主义在看似融合良好、受过良好教育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中普遍存在。同样,处于较高社会经济阶层的少数群体则感到他们在社会中遭到排斥和歧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来自较高社会经济阶层的少数群体成员同样会参与恐怖活动。

3.个人特点论

数十年来,很多学者一直在调查特定的人格类型是否或多或少地与从事犯罪或恐怖活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学者试图将自恋(Narcissism)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帕斯特(Post)认为自恋是一种自我满足的病态,一种不适应的自我痴迷,对其他所有人排斥,是统治者和野心家自私和无情的追求。具有自恋型人格特征的人容易受困于自身的宏伟目标。因此,他们需要外部敌人自己的弱点负责。^③克雷顿(Crayton)认为,自恋型人格的人容易被恐怖组织所吸引。^④

4.个人经历论

人们做出的决定通常基于个人经验,重大的生活事件可能会助长极端化。一些学者认为,激进主义和参与恐怖主义是个体在儿童时代遭受创伤所引起的典

① Ted Robert. Gurr, *Why Men Rebel*,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24.

② J. C. Davies, "Towards a Theory of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7, 1962, pp5~18.

③ J.M.Post, "Terrorist Psycho-Logic: Terrorist Behavior as a Product of Psychological Forces" ,in W. Reich (ed.), *Origins of Terrorism: Psychologies, Ideologies, Theologies, States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25~40.

④ J. W. Crayton, "Terrorism and Psychology of the Self" , in L. Z. Freedman, & Y. Alexander (Ed.),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Scholarly Resources, April of 1983, pp33~41.

型结果。^①被歧视感或被排斥的经历很可能会引发个人的愤怒和侵略。鲍迈斯特 (Baumeister) 和特温格 (Twenge) 讨论了社会排斥及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认为人们非常重视稳定、持久的社会关系, 而归属感对人类至关重要。社会排斥会导致自尊心受到伤害, 产生愤怒和侵略感。^②德沃尔 (DeWall. C) 发现社会排斥也会减少个体对社会的亲和行为并增加攻击行为。^③克鲁格兰斯基 (Kruglanski) 认为对个人价值的追求是自杀性恐怖主义的重要潜在动机, 称自杀式爆炸可能是对因个人创伤和沮丧而失去自我价值的回应。^④针对这种自我重要性的丢失, 个体可能会寻求恐怖手段, 并为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寻找合法的理由。在恐怖主义组织的集体记忆中, 代表组织进行自杀式袭击的人都会因成为“烈士”而感到高兴。为恐怖团体和更大的恐怖袭击活动做出的“奉献”会给个人带来荣誉, 并提供恢复尊严和个人意义的手段。

5. 催化剂

微观因素层面的催化剂种类包括招募运动和触发事件。极端势力的招募活动是由社会和个人力量驱动的, 包括与身份认同有关的事务、网络动态和个人动机, 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个体加入极端势力。在本研究中, 笔者假设招募始终需要潜在的招聘对象与招聘系统之间进行交互。在招募活动中, 自上而下的招募特别留意招募对象是否对极端势力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某种兴趣。招募过程本身与极端化过程有很大的重叠部分, 因此, 可以认为招募不能启动极端化过程, 而只能加速极端化。一方面, 招募涉及自上而下的组成部分, 极端组织在其中积极吸收新成员。另一方面, 个人自下而上地积极要求加入恐怖组织呈现增长趋势。正如约翰逊(Johnson)所说, 对于寻求身份认同的年轻穆斯林而言, 加入恐怖组织可能是发展和增强其社会身份的有效方式。^⑤凝聚力强大的恐怖组织内存在高度忠诚和团结的观念, 这增加了其对潜在成员的吸引力。马克·萨奇曼 (Marc Sageman) 将招募描述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 称“圣战”的威胁已从有组织的恐怖网络转

^① S. Akhtar, “The Psychodynamic Dimension of Terrorism” ,*Psychiatric Annals*, Vol. 29, No. 6, 1999, pp350~355.

^② R. F.Baumeister and J. M.Twenge, “Effects of social exclusion on cognitive processes: Anticipated aloneness reduces intelligent though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83, No.4, 2002, pp817~827.

^③ DeWall. C, “Social Exclusion Decreases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92, No. 1, 2007, pp56~66.

^④ A.W. Kruglanski, X.Chen, “Fully Committed: Suicide Bombers' Motivation and the Quest for Personal Significance”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30, No.3, 2009, pp331~357.

^⑤ P.W. Johnson & Feldman, “Personality Types and Terrorism: Self-Psychology Perspectives” ,*Forensic Reports*, Vol. 5, No. 4, 1992,pp293~303.

变为自发组织的主动“加入群”，这些人受到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的启发并积极寻求加入恐怖组织，而不是被外部力量招募。^①网络和个人关系会受到意外事件的影响，这些事件可能会在机构、社会和个人层面上表现出来。一般而言，要求报复或采取行动的挑衅事件可能会触发或加速极端化走向暴力。

在微观因素的个人层面上，导致极端化的诱因很多。例如找工作失败的沮丧感、亲戚或朋友的突然死亡、遭到歧视的个人经历或监禁都可能加速极端化。此外，通过个人对现实的感知，一些社会现象可能转化为诱因。领导人的特定讲话或某篇文章的发表可能被一些人视为挑衅，而另一些人则视为寻常小事。个体层面的诱因在每个人身上的反应都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他们对环境的感知和交互方式。

总之，极端化应被理解为“嵌入的个人过程”（embedded individual process），这意味着极端化的原因应从与社会环境不断互动的个体的角度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极端化的根本原因模型有助于对极端化的诱因进行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因果因素分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宏观因素可被视为塑造有利于极端化环境的前提，但是这些因素只能解释为什么社会群体成员之间会出现普遍的不满，而不能解释罕见和具体的个案。引入微观因素分析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为了强调个人作为社会嵌入的行为者，将微观因素进一步细分为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社会因素描述了个人如何通过社会互动和认同嵌入到将人们联系起来的社会结构中。这些因素可以解释个人受到谁的影响、从哪里得到信息、谁是我类和谁是他者等问题。个体因素描述了个体的经历和特征如何影响他对社会和环境的感知和反应。微观因素决定了导致极端化的个别情况，哪些因素会促成极端化以及何时促成极端化，因人而异。

三、恐怖主义的地区特点

恐怖主义的种类和实施暴恐手段多种多样，各地区有各自的特点。本文的研究案例涉及南亚、东南亚和西欧，因此本文对恐怖主义的地区特点归纳仅限于南亚、东南亚和西欧。

（一）南亚恐怖主义的特点

几十年来，南亚地区一直是各种恐怖主义威胁和跨国恐怖主义的主战场。其中的原因是该地区的多孔边界（porous border）容易渗透，宗教和族裔隶属关系极为复杂，这使得监控恐怖组织的越境活动极为困难。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多孔边界为宗教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跨界自由流动和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美国

^① M.Sageman, *Understanding Terror Network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PP1~8.

在南亚进行了反恐战争，但这里的主要伊斯兰恐怖组织仍拥有庞大的支持基础。南亚地区的恐怖组织有“基地”组织、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境内的一些极端组织。

1. 跨界恐怖主义活动是南亚恐怖主义的显著特点

跨界恐怖活动是南亚恐怖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南亚的主要恐怖主义网络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运动。“基地”组织中的主体民族普什图人居住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成为一种跨界民族。跨界民族普什图人对宗教的认同高于对国家的认同，他们可以在多孔边界自由往来，进行毒品贸易以及实施越境恐怖主义活动。除了巴阿边境外，宗教恐怖主义和民族恐怖主义还在克什米尔地区实施跨界恐怖主义活动。

2. “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是恐怖主义组织的主体

美国主导的“持久自由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摧毁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主义训练营和基础设施，俘获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领导人，以及阻止在阿富汗开展恐怖活动。目前大多数目标已经实现。但是，自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并随后撤退至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崎岖山区以来，这些“残余部队”重组并与基地组织的逃犯串联，对美国主导的联盟采取“打完就跑”的策略。这些武装组织往往能够在边界的巴基斯坦一侧找到庇护所。巴基斯坦一位高级官员曾说，南瓦济里斯坦（South Waziristan）是“全世界‘基地’组织行动的枢纽”。^①

3. 恐怖组织以毒品贸易为主要经济来源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支持者从加工和贩运海洛因中获得资金来源。2004年鸦片产量比上年增加了三分之二，据称阿富汗鸦片占世界供应的90%，鸦片贸易约占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巴基斯坦反毒品部队局长估计，阿富汗生产的70%的毒品是通过巴基斯坦贩运的。^②

4. 民族恐怖主义、宗教恐怖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是主要行为体

南亚的恐怖组织一直是由目标各异、意识形态不同的恐怖主义组织组成的。南亚的恐怖主义类型大概可以分为受民族主义政治鼓舞的民族恐怖主义、受宗教极端主义影响的宗教恐怖主义和种族—民族分离主义。在许多情况下，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可能既是民族恐怖主义组织，也是宗教恐怖主义或民族分离主义组织。

（1）民族恐怖主义

专注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怖组织在南亚活跃了数十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因克什米尔争端而产生的组织，他们发动的恐怖袭击仅在2007年就造成800人死

^① “Terrorism in South Asia: An Overview”,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March of 2010, p44.

^② “Terrorism in South Asia: An Overview”,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March of 2010, p53.

亡。自1971年印巴战争之后，克什米尔地区的大多数暴力事件的实施主体主要是三个组织：真主穆斯林游击队（Hizbul Mujahideen）、虔诚军（Lashkar-e-Toiba）和先知军（Jaish-e-Mohammad）。^①在这三个组织中，“真主穆斯林游击队”是唯一拥有有限政治目标、寻求克什米尔自治的组织，也是唯一主要由克什米尔人组成的组织。“虔诚军”和“先知军”与“真主穆斯林游击队”的不同之处在于：两者的大多数成员都来自巴基斯坦，针对印度的袭击主要受宗教因素的激发。围绕克什米尔争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敌对状态通常被认为是恐怖主义袭击的动因，例如2003年针对印度议会发动的恐怖袭击引发了两国之间的对抗。

（2）宗教恐怖主义

“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是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的两大恐怖主义势力。美国主导的反恐联盟推翻塔利班，并于2011年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后，这两股恐怖主义势力遭到重创，由原来的金字塔状的中心集中型转变为去中心化，分散到孟加拉国及东南亚地区。2005年8月17日，孟加拉国全国64个地区在一小时内几乎同时发生400起连环炸弹袭击事件，受宗教因素驱使的孟加拉圣战者大会党（JMB）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此外，好战组织也与犯罪活动有关。激进的宗教团体与有组织的跨国犯罪集团结合，增加了恐怖主义威胁的复杂性。

（3）民族分离主义

民族分离主义在南亚次大陆每个国家的恐怖活动都很活跃。声称代表少数泰米尔人的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LTTE）和代表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的斯里兰卡政府之间的持续斗争仍然是南亚最血腥的暴力活动之一。在过去的20年中，有超过64000人在冲突中丧生。^②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和信德省，印度的旁遮普邦和东北部各邦以及孟加拉国的吉大港都深受民族分离主义之苦。^③

根据基肖尔·达什（Kishore Dash）的说法，“跨境民族次国家主义”是南亚次大陆少数民族对政府不信任的主要根源之一。^④他解释说，由于南亚所有国家的少数民族与邻国的亲戚有紧密的联系，因此跨界种族身份认同在南亚普遍盛行。因此，一个国家内部的种族冲突往往得到了邻国同族群体的自然支持。毫不

^① D. Suba Chandran, “Jammu and Kashmir: India’s Objectives and Strategies”, *Swords and Ploughshares*, Vol.16, No. 1, Winter 2007–2008, PP.4–6.

^② K. Alan Kronstadt and Bruce Vaughn, “Terrorism in South Asi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rch 8, 2004, p37.

^③ Kishore Dash, “Explaining the Dynamics of Domestic Preferences for Deep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vention, March 22–25, 2006, p13.

^④ Eric Rosand, “Countering Terrorism in South Asia: Strengthening Multilateral Engagement”, Center for Global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May 2009, p5.

奇怪，这些种族冲突的溢出效应已导致每个国家都怪罪他国支持其领土上的分离运动。^①

（二）东南亚的恐怖主义

自2001年9月以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的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日益引人关注。“基地组织”通过在东南亚建立外围组织、在阿富汗的营地训练东南亚人、资助土著伊斯兰极端组织并与其合作，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渗透。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南部特别容易受到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渗透。

与基地组织有广泛联系的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团”（JI）成员为“9·11”事件的劫机者提供了帮助，并承认策划和攻击西方国家。2002年10月发生的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爆炸案是“9·11”事件以来最致命的恐怖袭击，造成约200人丧生，其中多数是西方人。^②自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以来，东南亚地区各国政府的“反恐”行动（在某些情况下得到了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鼓励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伊斯兰祈祷团”的实力，使其活动范围由一个地区收缩至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南部。

为了应对这一威胁，美国敦促东南亚国家逮捕可疑的恐怖分子和限制恐怖主义组织，资助和培训印度尼西亚的精锐反恐部队，并向菲律宾南部地区派遣部队，向菲律宾军队提供打击暴恐组织“阿布沙耶夫”（ASG）的建议。美国还发起了一项地区海上安全倡议，以加强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强化情报共享，恢复与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关系，并提请国会向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增加大量援助。自2001年以来，泰国和美国大大加强了“反恐”合作。总体而言，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迅速采取打击武装组织的措施，并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合作共享情报。与此不同，印度尼西亚只是在恐怖主义对本国公民构成严重威胁后才开始持续打击恐怖分子和极端组织。由于主流伊斯兰和世俗民族主义者对“反恐”问题很敏感，一些东南亚国家对美国不断施压感到左右为难。近年来，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叛乱不断升级，菲律宾南部的恐怖活动也在加剧。

1. 与“基地组织”共谋发起恐怖袭击

东南亚最大的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该组织的联合创始人阿布·巴卡尔·巴希尔（Abu Bakar Bashir）和阿卜杜拉·桑卡尔（Abdullah Sungkar）要求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伊斯兰教法。20世纪

^① Eric Rosand, “Countering Terrorism in South Asia: Strengthening Multilateral Engagement”, Center for Global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May 2009, p6.

^② Bruce Vaughn,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16, 2009, p1.

70年代，两人在爪哇岛建立宗教学校，宣扬瓦哈比教派的思想。1985年两人逃到马来西亚并建立活动基地，帮助派送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人到阿富汗战场抵抗苏联的侵略，这些人员在“基地组织”的营地接受了培训。桑卡尔和巴希尔于1993~1994年建立了“伊斯兰祈祷团”，完善组织结构并积极招募东南亚恐怖分子。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伊斯兰祈祷团”开始与基地组织建立紧密联系。1998年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垮台，政府极大地放松了对“伊斯兰祈祷团”的管控。桑卡尔和巴希尔重新回到印尼的爪哇岛，公开宣讲并组织极端宗教活动。同时，印尼在其外岛维持秩序的能力急剧下降，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一些矛盾开始爆发。

关于“伊斯兰祈祷团”和基地组织之间的关系争论很大。根据对被捕的JI和“基地组织”操作员的讯问得知，这两个组织间的关系松散，议程虽然不同，但部分成员拥有双重身份。^①基地组织的关注点是全球性的，并明确地瞄准了西方，而“伊斯兰祈祷团”则专注于东南亚。一些“伊斯兰祈祷团”头目认为攻击西方会破坏这一目标。^②尽管关系松散，但两个组织已经建立了紧密的共生关系。据报道，两个组织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棉兰老岛共享训练营，且“基地组织”为后者提供了可观的财政支持。^③有时两个组织也会共享技术，例如JI派遣了掌握科学知识的特工前往阿富汗，试图为“基地组织”制定炭疽病计划。这两个组织除了共同策划“9·11”袭击事件外，还共谋在东南亚发动恐怖袭击。^④

2. 结构较“基地组织”更为松散

伊斯兰祈祷团核心成员高峰时的总数约为500至数千人。2000~2001年间，“伊斯兰祈祷团”组建区域咨询理事会，由汉巴里（Hambali）出任领导，桑卡尔和巴希尔担任精神领袖。理事会之下，是几个职能委员会和四个区域旅，负责筹款、宗教灌输、军事训练和武器采购。每个区域旅又分为至少三个分层：营、排和小队。^⑤实际上，即使在最高峰时，“伊斯兰祈祷团”的组织方式还是比较松散的。“伊斯兰祈祷团”成员通常在其控制范围之外与其他组织合作，因此人们往往很难厘清JI与其他极端组织之间的界限。东南亚各国政府对“伊斯兰祈祷

① Zachary Abuza, “Funding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The Financial Network of Al Qaeda and Jemaah Islamiyah”, *NBR Analysis*, December 2003, pp11~12.

② Eric Schmitt, “Southeast Asia Sees Gains against Insurgenci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9, 2008.

③ Sidney Jones, “Jemaah Islamiyah in South East Asia: Damaged but Still Dangerou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Report*, August 26, 2003, p1.

④ Bruce Vaughn,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16, 2009, p6.

⑤ Jones, “Jemaah Islamiyah in South East Asia”, pp 27~28.

团”高层领导的逮捕加剧了该组织结构松散的发展态势。

3.恐怖主义组织及其袭击事件

(1) “伊斯兰祈祷团”

“伊斯兰祈祷团”首次进入公众视线始于2001年12月，当时该组织在新加坡的两个分支机构策划了对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以色列的设施和公民实施的炸弹袭击，新加坡内务安全部（ISD）对其进行了突袭，挫败了暴恐阴谋。之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又逮捕了暴恐策划者，经过审讯得知“伊斯兰祈祷团”在马来西亚的分支机构参与了策划，包括采购炸弹制造材料、伪造旅行证件以及与“基地组织”联系等。^①2002年6月，应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要求，印度尼西亚警方逮捕了一名科威特籍“基地组织”嫌疑人奥马尔·法鲁克（Omar Al-Farouq），并将其引渡给了美方。经过3个月的审讯，法鲁克承认自己是“基地组织”在东南亚的高级代表，并透露了针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恐怖袭击计划。2002年10月12日，“伊斯兰祈祷团”和“基地组织”共谋袭击西方游客经常光顾的巴厘岛夜总会，造成约200人死亡，300人受伤，受害者主要是澳大利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也包括几个美国人、加拿大人、欧洲人和日本人。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促使印尼政府改变此前不愿调查“伊斯兰祈祷团”的意愿。爆炸发生后的几天，印尼高级官员首次承认“基地组织”在印尼与“伊斯兰祈祷团”共谋发动袭击的事实。^②

2003年8月，雅加达万豪酒店爆炸案炸死10多人，数十人受伤。2004年9月，澳大利亚驻印尼大使馆遭到炸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200人受伤。2005年4月，两名劫机者向美国中情局承认“伊斯兰祈祷团”在马来西亚的分支机构参与了“9·11”袭击事件的策划工作。2005年10月，“伊斯兰祈祷团”第二次袭击巴厘岛，造成20多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两名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③2008年6月1日，一群和平示威者在雅加达举行示威，遭到伊斯兰捍卫者阵线（IDF）的暴力袭击。2009年7月17日，雅加达的万豪酒店（J.W. Marriot）和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几乎同时发生暴恐袭击事件，造成9人死亡，5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6名美国人。此次袭击的主谋“伊斯兰祈祷团”成员马来西亚人纳丁·穆罕默德（Nardine Muhammad）2009年9月被印尼警方在爪哇岛中部击毙。^④

① Bruce Vaughn,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16, 2009, p8.

② Ellen Nakashima and Alan Sipress, “Al Qaeda Linked to Blast by Official,”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5, 2002.

③ R. Pura and L. Lopez, “Bali Blast Signals Militants Rebirt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3, 2005.

④ Bruce Vaughn,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16, 2009, p11.

(2) “阿布沙耶夫” (Abu Sayyaf)

“阿布沙耶夫”是菲律宾境内的恐怖组织，主要在棉兰老岛西部边缘以及从棉兰老岛延伸出来的苏鲁群岛上活动。该组织与“基地”组织有联系。2001年5月，“阿布沙耶夫”绑架了3名美国公民并杀害其中的2名。2002年以来，菲律宾在美国的支持下对“阿布沙耶夫”采取军事行动，使其武装力量从大约1000人下降至400人左右。^①据报道，“阿布沙耶夫”和“伊斯兰祈祷团”组织了联合培训，重点是炸弹制造和城市爆炸技术培训。^②2005年，“伊斯兰祈祷团”帮助“阿布沙耶夫”训练大约60名技术人员，主要从事炸弹的组装和引爆。2003~2009年，“阿布沙耶夫”与“伊斯兰祈祷团”共谋实施多起炸弹袭击事件，其中包括对马尼拉的炸弹袭击。^③

(3)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是菲律宾南部较大的反叛组织，20世纪70年代后期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脱离出来，现有10000~12000名成员，主要政治目标是将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地区分离出来，建立独立的伊斯兰政府。包括被捕的“伊斯兰祈祷团”领导人的证词在内的证据表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与“伊斯兰祈祷团”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在“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营地对“伊斯兰祈祷团”恐怖分子进行培训和策划恐怖活动。^④美国研究东南亚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专家扎卡里·阿布扎 (Zachary Abuza) 表示，自2002年以来，“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司令部与“阿布沙耶夫”之间建立了更牢固的合作关系。^⑤为了和平解决“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与政府间的冲突，菲律宾政府在2001年与其签订了停火协议，由马来西亚领导的国际观察小组于2004年10月开始监督停火。但是，菲律宾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就建立“班萨莫罗” (Bangsamoro) 自治州的问题陷入僵局，原因是“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坚持要将棉兰老岛西部、苏鲁群岛和巴拉望岛的部分地区划入自治州。2008年马来西亚宣布退出国际停火观察团。同年，菲律宾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等组织签订建立“邦萨莫罗司法实体” (BJE) 的协议备忘录，同意在包括棉兰老岛大部分地区在内的一些村庄和城镇通过公民投票确定其归属。协议备忘录缔结后，棉兰老岛上的基督教人

① Bruce Vaughn,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16, 2009, p17.

② Abuza, Zachary, “Balik-Terrorism: The Return of the Abu Sayyaf”, U.S. Army War College, 2005, p27.

③ Mogato, “Philippine Rebels Linking up with Foreign Jihadists”, Reuters News, August 21, 2005.

④ John McBeth, “Across Border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 22, 2004, p27.

⑤ Abuza, “Balik-Terrorism: The Return of the Abu Sayyaf”,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September 2005, pp 14~19;22~24.

士和官员立即向菲律宾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阻止该备忘录。最高法院于2008年10月14日裁定，《协议备忘录》违反宪法。

（4）泰国南部叛乱组织

泰国南部地区的叛乱活动可追溯到20世纪初。泰国穆斯林长期以来一直对被边缘化和歧视表示不满，泰国南部穆斯林采取报复社会的暴恐行为。2009年泰国安全部队采取镇压行动，造成3400多人死亡。死者包括泰国佛教徒，特别是僧侣和教师，以及当地穆斯林，根据国际危机组织的说法，遇难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穆斯林。^①

（5）马来西亚国内的恐怖组织

除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祈祷团”以外，在马来西亚活动的其他极端主义组织包括“阿布沙耶夫”组织和马来西亚“坎普兰穆吉赫丁”（KMM）。据报道，“阿布沙耶夫”组织2000年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度假胜地绑架游客。马来西亚“坎普兰穆吉赫丁”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极端组织，其宗旨是要求推翻马来西亚政府，并建立一个涵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南部的泛伊斯兰国家。该组织成立于1995年，马来西亚当局估计其成员不到100人。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局称，马来西亚“坎普兰穆吉赫丁”与“伊斯兰祈祷团”和马鲁古斯群岛及菲律宾的极端伊斯兰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②

（三）西欧的恐怖主义

在传统意义上，欧洲面临三种类型的恐怖主义：民族主义恐怖分子，例如爱尔兰共和军（IRA）和埃塔（ETA）；左翼恐怖主义，如意大利红衫军（Red Brigade）和德国红色旅（RAF）；以新纳粹团体（neo-Nazi groups）为代表的右翼恐怖主义。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以“圣战”为名的恐怖主义。许多欧洲国家对恐怖主义新发展的认识相对滞后，以至于西班牙马德里爆炸事件或多或少地使人感到意外。欧洲恐怖主义网络的特点是什么？圣战恐怖分子的特征是什么？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美国中情局前警员马克·萨奇曼（Marc Sageman）选取200多个欧洲恐怖分子及其网络作为研究个案进行研究，他审查了2001年9月至2006年9月间参与欧洲恐怖活动的个人和网络。为了得出更为客观的结果，马克·萨奇曼将欧洲的200个恐怖分子与全球其他地方的172名伊斯兰恐怖分子进行比较，在比较中他选取了17个变量，并将其分为三组：社会背景、心理状态和加入“圣

^① “Recruiting Militants in Southern Thailand”,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June 22,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crisisgroup.org/home/index.cfm?id=6170&l=1>.

^② Bruce Vaughn,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16, 2009, p26.

战”的环境。^①

每个变量都与一个或多个研究问题相关。这些问题通常与经过检验的关于恐怖主义的一般概念和理论假设有关。例如，“社会经济地位”主要调查恐怖分子属于上层、中层还是下层阶级，或者调查恐怖分子的恐怖行为是否在不对称的权力状况下由贫困加剧所致？恐怖分子婚姻状况如何？恐怖分子是否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此外，萨奇曼通过调查得出结论：与大多数有关恐怖分子的叙述相反，他所调查的大多数恐怖分子都是已婚状况，且多数有孩子，但他们愿意为“圣战”牺牲自己。对“心理状态”类别的变量研究还包括对各种精神疾病的讨论，以及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病理性人格动态的探究。在加入“圣战”的情况类别下，萨奇曼调查了那些没有实现期望上升的人群，调查结论可能支持相对剥夺论。基于对变量的分析，萨奇曼否定了许多有关恐怖分子的社会解释。他认为，有关恐怖分子贫穷、愤怒和具有狂热的宗教信仰等刻板印象是一个神话，因为在他的样本中，“圣战”恐怖分子通常是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来自有同情心的家庭和宗教家庭。^②

总之，在萨奇曼研究的242名“圣战”恐怖分子中，因为不可能从公开资料中收集到所有变量的完整信息，所以得出的一些判断比较粗略。尽管如此，还是有或多或少的共同特征：恐怖分子的祖籍绝大多数来自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北非（主要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些第一代、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中的许多人来自社会底层，许多在之前有过犯罪记录。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欧洲几乎所有的“圣战”恐怖分子都是男性，他们中许多人是通过亲属关系或朋友关系而加入恐怖主义组织的。

四、结语

现当代恐怖主义的滥觞主要始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因抵制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兴起的“圣战”运动。导致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既有宏观因素，又有微观因素。宏观因素包括历史政治根源、政治暴力和经济社会根源。从历史政治根源来看，恐怖主义可以解释为弱势群体对当前国际体系所支持的领土、权利和资源分配的挑战。恐怖主义将当前的国际体系看作是不公正不公平的，认为自己是在捍卫弱

^① Edwin Bakker, “Jihadi terrorists in Europe: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y joined the jihad: an exploratory study”,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December 2006, p9.

^② “Jihadi Militants Defy Stereotypes”, *Washington Times*, 5 July 2004.

者的权益，并惩罚强者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从政治暴力因素来看，政治暴力是由相对剥夺之后发生的社会挫败感造成的，主观上感到被相对剥夺的群体使用政治暴力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改变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政治和经济现状。在经济社会根源层面上，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侵蚀了民族认同感，形成了宗教激进主义滋生的土壤。微观因素包括社会认同危机、相对剥夺感、个人特点和个人经历。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有着各自的总体特征，南亚是恐怖主义的重灾区，是因抵抗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发动“圣战”的前沿阵地，是恐怖主义的温床和避难所。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毒品贸易，跨界袭击是南亚恐怖主义的最显著特征；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祈祷团”与南亚的“基地”组织有紧密的联系，在许多暴恐袭击事件中都有这两个组织共谋的影子。东南亚恐怖主义通常以西方人经常出入的旅游景点、酒店和餐馆为袭击目标；西欧恐怖主义者多为中东、北非和南亚的移民（包括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其袭击目标主要集中在首都和重要国际组织所在地。欧洲恐怖分子大多有犯罪前科，恐怖组织的招募方式主要通过亲戚关系和朋友网络进行招募。

[责任编辑：王国平]